

· 专题研究 ·

陈列帝国：汉上林苑的博物空间 及其方术、政治理想*

周金泰

〔摘要〕建元三年，汉武帝对上林苑进行扩建，改变了此前王家苑囿就地围以周垣的传统做法，表现出物种多元性追求。苑内物种虽各有实际用途，但亦有陈列以供欣赏的展示功能。因此，上林苑虽为满足帝王游猎兴趣而设，但亦可视为展示自然的博物空间。苑内异域珍稀物种被突出强调，并依宇宙及地理秩序进行布局，形塑出“微缩天下”的视觉效果。台观、复道、异物的排列组合以及昆明池等象天景观的营建，又使上林苑模拟了仙界，被建构成可招致神物的方术空间。皇帝于苑中狩猎及接待外宾，接触并征服苑内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物种，是帝国实力的一种展演。上林苑将物种陈列、求仙实践与帝国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座隐含权力与信仰的意识形态景观。

〔关键词〕上林苑；博物空间；汉武帝；方术；帝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3)02-0037-14

上林苑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王家苑囿，原为秦旧苑，建元三年（前138年），经汉武帝扩建后，规模臻于鼎盛^①。尽管上林苑存在时间并不长，可能两汉之际就已毁于赤眉战火^②，但因其深刻介入过帝国历史^③，故至今仍挥之不去的“风景记忆”^④。今天，上林苑旧址的考古工作仍在有序进行^⑤，史学界也对上林苑做过不少研究，其思路大致可总结为三种：第一，对上林苑地理范围、生态环境及苑内宫观、池沼、动植物进行基础考证^⑥；第二，整体讨论上林苑园林功能、管理状况及其与都城发展的关系^⑦；

*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先秦两汉出土月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YBQ039）。本文初稿曾报告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青年史学沙龙（2020年9月9日），感谢与会同人的批评指正。

- ① 汉武帝扩建上林苑经过见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47~2851页。
- ② 班固《西都赋》称东汉初年上林苑“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表明彼时上林苑已成废墟。
- ③ 本文所使用的“帝国”一词，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狭义帝国（对内实行多民族差异政策，对外表现出扩张倾向），而是一般意义上强调幅员辽阔、传统悠久、君主可实行强有力集权统治的帝国。相关辨析可参看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第29~40页。
- ④ 人类塑造自然的同时也被自然塑造着，因此，多样的风景体验背后隐藏着深层文化记忆，相关讨论见西蒙·沙玛著，胡淑陈、冯榭译：《风景与记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 ⑤ 近年来考古成果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秦汉上林苑：2004—2012年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
- ⑥ 1942年，冉昭德先生所撰《汉上林苑宫观考》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作，见杨倩如编：《冉昭德文存》，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71页；其他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徐卫民：《西汉上林苑宫殿台观考》，《文博》1991年第4期，第34~41页；徐卫民：《西汉上林苑的几个问题》，《文博》1994年第4期，第17~23页；王社教：《西汉上林苑的范围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第223~233页；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203页；徐卫民：《秦汉都城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210页；李健超：《上林苑生态环境的变迁》，《生态学杂志》1984年第6期，第41~43页；梁陈：《秦汉上林苑的动物资源及其利用与管理》，《宁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32~37页；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 ⑦ 如周亚：《秦汉上林苑的功能及其与都城发展之关系》，“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河南郑州，2004年；喻曦：《浅析秦汉上林苑农业的多功能性》，《中国农史》2012年第3期，第3~10页；郭建新、朱宏斌：《秦汉时期上林苑管理述论》，《农业考古》2017年第1期，第163~166页；雷铭：《秦汉禁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此外，龙岗秦简《禁苑律》的出土为讨论上林苑管理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新材料，相关研究可参看马彪：《从秦简禁苑律重新认识秦代上林苑》，《唐都学刊》2016年第6期，第78~88页。

第三,从艺术史、思想史等视角解读上林苑的营造观念^①。

上述第三种思路,反映出上林苑研究新的动向:不拘泥于地理、经济等物质史视角,而是讨论“作为思想史的上林苑”。以此为基础,本文将继续对上林苑进行研究视角转换:尝试引入“博物空间”这一概念,考察上林苑如何陈列及展示自然物种,并从阐释学角度揭示上林苑空间布局背后的博物观念以及此种空间布局意欲施加给观看者的情感与意义。从博物空间视角“观看”上林苑,它将不再仅是一座简单的供帝王游猎的王家苑囿,而且也是一座隐含了权力与信仰的意识形态景观。

一 “博物空间”及以之研究上林苑的可行性

本文提出“博物空间”这一概念,是基于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的理解。博物学是当下热点学术概念,指对自然物种进行辨识、命名、分类、描绘、搜集及展示的一类知识^②。当物种付诸展示环节时,植物园、动物园、自然博物馆等博物空间应运而生^③。特别是自然博物馆,它将不同地域物种聚拢一处,在有限空间内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了“自然”,科学地为物种命名、分类并排序正有赖于此。因此,自然博物馆从根本上改变了博物学研究,并为博物学最终转变为一门学科立下了汗马功劳^④。19世纪末,自然博物馆在欧洲大行其道,昭示了所谓“博物学黄金时代”的到来。

科学史界对自然博物馆的关注由来已久,研究者大多注意到自然博物馆在近代自然专科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自然博物馆也承担起公众科普教育的重任,从这层意义上讲,自然博物馆不失为时代智识中心^⑤。随着研究深入,自然博物馆智识功能之外的权力意义被发现了,这里不得不提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的名著《想象的共同体》。在该书中,博物馆的建立被认为是催生现代民族想象的重要环节^⑥。当然,安德森那里博物馆的概念范围要大得多,并且可能特别强调了历史博物馆的作用,但自然博物馆塑造民族认同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当一个国家境内多元物种被集中展示于一处,该国观众无法不对之产生心理认同,不仅因为“地大物博”是体现国家自豪感的常见修辞,更因为基于地理单元的现代国家往往也表现出物种上的特殊性,例如枫叶、郁金香、袋鼠等物种各有何国家隐喻,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以我们国家最具特色的物种熊猫为例,1933年,在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的努力下,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完成重建,修缮一新的新馆重点展示的正是熊猫标本。在那个贫弱的年代,当国人走进自然博物馆目睹这种憨态可掬的本国独有物种时,内心多少会涌起些自豪吧^⑦。当然,这次展出可能引发了随后全球探险

① 刘晓达的研究较具代表性,参氏著:《汉武帝营造上林苑的动机与观念来源》,《美术研究》2014年第3期,第43~47页;《汉武帝时代的上林苑与“天下”观——以昆明池、建章宫太液池的开凿为论述中心》,《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第5~10页。文章修改后均收入氏著:《王者无外天下一家:美术史视野中秦汉汉武帝时代“天下”观》,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

② 学界对中国古代博物学概念多有探讨,代表性成果有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世界·前言》,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吴国盛:《博物学:传统中国的科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第11~19页;周金泰:《孔子辨名怪兽——试筑一个儒家博物学传统》,《史林》2021年第1期,第59~70页;周金泰:《书写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历史:概念、语境与方法》,《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59~168页。

③ 相关讨论可参埃里克·巴拉泰、伊丽莎白·阿杜安·菲吉耶著,乔江涛译:《动物园的历史》,台北:好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凯茜·威利斯、卡罗琳·弗里著,珍砾译:《绿色宝藏:英国皇家植物园史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④ 关于收藏在博物学史发展中的作用可进一步参看保罗·劳伦斯·法伯著,杨莎译:《探寻自然的秩序:从林奈到E. O. 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42页。

⑤ 关于“博物馆式科学”(museological science)与近代欧洲科学发展关系的讨论可参看约翰·V·皮克斯通:“博物馆式科学?——19世纪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分析/比较之地”(John V. Pickstone, “Museological Science? The Place of the Analytical/Comparative in Nineteenth 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第32期(1994年),第111~138页。

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昊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179页。国内学者亦有同类研究,如徐坚讨论了博物馆在近代中国国族塑造中的作用,参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2~143页。薛冰清以美国皮尔博物馆为例,讨论了文化事业在美国早期国族建构中的作用,见薛冰清:《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国族构建——以皮尔博物馆为中心》,《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第94~106页。

⑦ 关于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发展史,可参戴丽娟:《展示自然——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及其科普活动(1874—1952)》,《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旧学新知——中欧知识与技术之演变》,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2~116页。

家相继来华猎杀熊猫的风潮,此是后话^①。另一方面,现代自然博物馆普遍建立于19世纪末这个特殊时间节点——此时正值所谓“帝国的年代”——也提醒我们,自然博物馆可能还表现出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展出来自殖民地的物种,不单单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同时也是展演帝国实力的一种途径^②。

博物空间具有超越自然的复杂文化内涵,但无需回避,这一结论是基于近代欧洲历史经验得出的,特别是在19世纪以降博物空间被编织进入帝国主义光谱之后。本文以博物空间为视角讨论汉代上林苑,不得不回应两个问题:第一,上林苑可以被视为博物空间吗?第二,如果上林苑是一个博物空间,那么基于近代欧洲历史的研究经验是否可以为之提供借鉴?

第一个问题争议并不大。尽管博物空间的复杂文化内涵大多表现出现代性特征,但博物空间本身并非如此,因为只要一个空间满足“聚集物种”这个基本条件,那么无论聚集行为是否具有主观性,事实上它都可以被称作博物空间了。而一旦这种聚集行为具有将物种付诸展示的主观意愿,那么该空间被称作博物空间的条件就更加成熟。由此可见,博物空间并非晚近事物,例如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y)等人追溯动物园发展历史,便从古埃及神庙供奉神兽及中国帝王宫殿饲养动物讲起^③。甚至传统中国苑囿史研究中,已经有部分成果开始体现出博物空间研究取向了^④。

但是,近代博物空间——特别是以自然博物馆为代表的近代博物空间——其复杂文化内涵,包括作为时代智识中心的科学内涵、塑造群体认同的国族内涵、展演帝国实力的殖民内涵等,则显然不存在于古代。不过,我们认为发生改变的仅是文化内涵之内容,制造文化内涵之方式却古今相通,包括:第一,博物空间所陈列物种具有复合含义;第二,博物空间的布局遵循了特定规则,首先反映了布局者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其次也贯注了布局者意欲传达给观看者的特殊情感;第三,博物空间具有“展示自然”之外的意识形态功能,国家主导建立的博物空间尤其如此。

以上构成本文以博物空间为视角研究上林苑的基本预设。在气化宇宙论模式下,古人对于自然物种具有复杂认知;在关联思维支配下,古代空间也呈现出秩序隐喻;在儒家经典中,著名的周文王灵囿是不断被祖述的王政意象。这些常识足以支持上述研究预设付诸实践——中国古代博物空间同样存在丰富文化内涵,尽管内容不同于近代欧洲,但内涵发生逻辑却具有相似性。

汉上林苑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王家苑囿传统,并且融入汉武帝“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的时代语境中,可视为汉武帝异域扩张、搜求异物之延伸。从这层意义上讲,探讨苑中别有深意的物种命名、分类、布局所隐喻的博物观念以及物种展示背后的帝国意图,不仅是受现代博物空间研究启发,同样也可为进一步理解博物空间的文化内涵提供源自中国古代的独特经验。

二 上林苑所陈自然物种及其功能考辨

从博物空间视角解读上林苑,基础工作是考辨苑内所陈物种。上林苑以“苑”为名,汉代“苑”乃“囿”之别称,“囿”之功能是饲养动物以供帝王游猎^⑤。同时,上林之“上”又点明其皇家私属性质。若仅从命名判断,上林苑应为“皇帝游猎之地”。在此意义中,苑内物种就只为配合游猎而设。那么,若欲证上林苑的博物空间属性,就必先证苑内物种具有展示及观赏功能。

先看动物。苑中动物并不限鹿、麋、獐等猎用动物,而是遍布珍禽异兽。李健超曾据《上林赋》《长

① 关于近代熊猫猎杀史,可参看亨利·尼科尔斯著,黄建强译:《来自中国的礼物:大熊猫与人类相遇的一百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9~54页。

② 伊恩·杰拉德·米勒(Ian Jared Miller)所著《野兽的本性:东京动物园中的帝国与陈列》是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论著,该书认为东京动物园兼具博物馆、大学、监狱三重性质,动物园协助着帝国生成,并成为现代国家力量的展演,伊恩·杰拉德·米勒:《野兽的本性:东京动物园中的帝国与陈列》(Ian Jared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柏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③ 埃里克·巴拉泰、伊丽莎白·阿杜安·菲吉耶著,乔江涛译:《动物园的历史》,第12~14页。

④ 参余慧君:《从皇家灵囿到万生园——大清帝国的动物收藏与展示》,《新史学》(台北)第29卷第1期,2018年3月,第1~57页。

⑤ 《周礼·地官·叙官》贾公彦疏文云:“古谓之囿,汉家谓之苑。”(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00页)

全用于狩猎这一事实,对苑内动物应作“常见”与“罕见”的区分。常见动物多产自长安本地,饲养数量庞大,且多具实际用途,如饲养于“鱼台”“犬台”“兽圈”的动物。从其敷衍宫观名不难推断,其间动物并不珍贵且饲养量庞大,因此这类宫观具有“动物饲养基地”的性质,待动物长成后,亦各有实际用途。我们根据相关史料总结出狩猎、游戏、食用、创收、祭祀五种主要用途,并推断了这些动物可能的饲养地:

表 2 上林苑常见动物实用功能举例

功能	动物举例及可能的饲养地	史料举例
狩猎	鹿、麋、獐、狐、兔等常见狩猎动物,饲养于“兽圈”等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材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 ^①
游戏	熊、虎、马、狗等用于斗兽、竞赛的动物,它们可能饲养于“犬台”“兽圈”等地,待到游戏之用时,再移至专门的“长杨宫”“走马观”等地	秋冬校猎其下,命武士搏射禽兽,天子登此以观焉 ^②
食用	猪、牛、羊、鱼等食用动物,饲养于“鱼台”“兽圈”等地	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麋兔无数。饮飞具增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 ^③
创收	令民养鹿,政府收抚鹿失,饲养于“兽圈”等地	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到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 ^④
祭祀	鱼鳖等祭祀动物,饲养于“鱼台”等地	上林苑中昆明池、镐池、牟首诸池,取鱼鳖,给祠祀 ^⑤

罕见动物则未必出现于上述实用场合,它们多依靠进贡或战争从异域获得,数量稀少且得之不易,不可能轻易被猎杀或食用。如观象观、白鹿观、鱼鸟观等,应以饲养罕见动物为主。这些地点仅达“观”之规模,也暗示其饲养量有限。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 121 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⑥,其中驯象很可能安置于观象观。能言鸟,师古注“即鸚鵡也”,则可能安置于鱼鸟观。鱼鸟观所饲养鱼鸟应非寻常品种,而是具有观赏价值的罕见鱼鸟。白鹿,上文引《平准书》已指出可制作皮币,足见珍贵。又,《山海经·西山经》记载上中山多白鹿,是为异兽^⑦。白鹿在秦汉时代已被普遍视作政治祥瑞,前引武帝发行白鹿皮币不仅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据褚少孙所补《孝武本纪》,亦有“发瑞应”意图^⑧。由此可见,罕见动物或产自异域,或被视作祥瑞,均是可满足猎奇心理的“异物”,应以观赏用途为主。至于实用性动物,尽管它们观赏价值不高且一般难逃被猎杀的宿命,但它们毕竟曾真实成长于上林苑之中,从而和罕见动物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动物生态系统。从这层意义上讲,它们同样被“展示”着。

除动物外,上林苑也有丰富的植物。《西京杂记》卷一“上林名果异木”条集中记载了苑内植物,开篇云:“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接下来便详列草木品名,如梨十、枣七、栗四、桃十、李十五、柰三等。每类目下又可细分,如梨十下便是紫梨、青梨、芳梨、大谷梨、细叶梨等十种梨树名,全篇记载约九十四种名果异树。结尾又云:“余就上林令虞渊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余种。邻人石琮就余求借,一皆遗弃。今以所记忆,列于篇右。”^⑨由于《西京杂记》的笔记小说性质,上述记载不能尽信,结尾称上林苑草木名达两千余种,更属夸张。篇末邻人弄丢草木名情节,应是杜撰,用以辩解作者为何无法列出全部草木名。细审《西京杂记》所列植物,不乏虚拟想象者:如沙

① 班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 3831 页。

②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 290 页。

③④⑤ 《汉官旧仪》卷下,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51、51、50 页。

⑥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76 页。

⑦ 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年版,第 52 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 582 页。关于秦汉时代白鹿祥瑞意义的讨论可进一步参看刘敦愿:《古俗说鹿》,《民俗研究》1986 年第 2 期,第 24~32 页;韩帅:《秦汉时期“鹿”的动物文化学思考》,“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北京,2009 年。

⑨ 周天游:《西京杂记校注》,第 50~51 页。

棠见于《山海经·西山经》，是一种食用后可使人免于溺水的奇异植物^①；又如西王母枣，原本可能仅是西域枣，托名西王母并云产自昆仑，应是隐喻其有长生功效；再如千年长生树、万年长生树之类，可能原指冬青树或者榿树，但冠以“长生”之名，亦有夸张之嫌。这些奇草异木可能是“制为美名，以标奇丽”，也可能本身就不存在。

但《西京杂记》所记草木品类繁多，有些产自关中本地，有些则引种自异域，且不乏品种珍贵者，这些记载并非全无凭据。《汉书·东方朔传》就曾提到苑中有豫、章、檀、柘、梨、栗、桑、竹、秔稻、麻、姜、芋等多类植物^②。现代学者对古籍所载上林苑植物做过研究，共考证出 61 科 94 属 116 种以及存疑的 15 种植物^③。但他们的工作方法有待商榷，将汉赋、《西京杂记》和《汉武帝洞冥记》等文学作品中的植物一并算入，未判断这些记载是否可靠，因此参考价值有限^④。与动物情形近似，判断上林苑植物比较稳妥的方法也是依靠宫观名，如杕诣宫：“杕诣，木名，宫中美术茂盛也。”^⑤又如长杨宫：“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⑥上林苑中植物名宫观极多，见于载籍的还有五柞宫、葡萄宫、骀荡宫、青梧观、白杨观、细柳观、柘观等^⑦，由此不难想象苑内植物品类繁多。此外，苑内池沼众多，亦有以植物入名者，如蒯池因野生蒯草而得名，《三辅黄图》云：“蒯池生蒯草以织席。”^⑧又，上林苑中有韭泽，顾祖禹推测云：“池中有自生之韭，亦名韭泽。”^⑨但需要指出的是，以动物命名宫观，则该宫观就饲养该类动物，但以植物命名宫观，却未必有这层关联。通常只因宫观附近多植某类植物，便以其入名，但宫观却有他用，如长杨宫虽因宫中多植垂杨而得名，但本身却是游猎之所：“长杨宫……宫中有垂杨数亩，因为宫名，门曰射熊馆。秦、汉游猎之所。”^⑩

苑内植物多有实用功能，最重要的是为苑中动物提供栖息地，以植物多样性保障动物多样性。此外还有绿化、降温、增湿等生态功能，从而使上林苑成为长安城内重要的“城市绿地系统”^⑪。又因上林苑禁苑性质，许多植物最终为皇室所用，或提供时令蔬果，或提供各类建筑及器物所用木材。如苑中栗木就曾用于制作礼器，《汉官旧仪》载：“上林给栗木，长安祠庙作神主。”^⑫

苑内植物同样表现出展示及观赏功能。前引《西京杂记》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相近表述亦见于《三辅黄图》《述异记》《西阳杂俎》等。虽然这些文献动辄称苑内植物多达两千余种，不足凭信，但所称“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则可能确有其事。因为从《史》《汉》及植物宫观名所反映的情形来看，苑内植物绝非就地取材的“原生林”，而是经过人工干预的“杂树林”。而杕诣宫、青梧观、白杨观等，又提示苑内植物各有特定栽植区域，显然经过了一番规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葡萄宫等宫观，表明上林苑曾栽培异域植物，据《史记·大宛列传》，葡萄由汉使从西域带回，武帝将其大面积植于离宫别观旁^⑬。但西汉食用葡萄未成风尚^⑭，其种植恐怕仍以展示功能为主。上林苑植物经过人为规划而突破地域所限，并热衷于栽植域外稀见植物，足以说明在此空间内，植物同样表现出展示及观赏功能。

综上所述，上林苑虽为帝王游猎之地，但同时也具备了博物空间属性。

①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 42 页。

② 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 2849 页。

③ 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④ 但该书在上林苑研究领域影响极大，不少论著直接利用该书成果讨论苑内植物资源或引种情况，稍欠审慎，如朱红兵、邓敬刚所著《和而不同：历史时期域外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直接在该书基础上讨论域外引种技术，认为《上林赋》《西京杂记》《汉武帝洞冥记》等文献提到各类域外植物均在汉代引种成功，这一结论令人怀疑。

⑤⑥⑧⑩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 178、37、268、37 页。

⑦ 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第 22~24 页。

⑨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523 页。

⑪ 周亚：《秦汉上林苑的功能及其与都城发展之关系》，“郑州商都 3600 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 2004 年年会论文。

⑫ 《汉旧仪补遗》卷下，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第 106 页。

⑬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852 页。

⑭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44~73 页。

三 展示异域与再现天下:上林苑的空间布局特点

上节论证了上林苑动植物具有展示及观赏功能,但仍需说明的是:“展示”是有意为之的,“观赏”是能与“展示”产生情感互动的。博物空间如何布局具有主观性,例如现代自然博物馆普遍采取“栖地展示”(habitat diorama)模式,主要目的是“再现自然”,并依时间序列展示自然进化,有时也展示物种间残酷斗争。其用意不仅是普及自然知识,也是希望唤起观看者有关生存、竞争及生死的人文思考。

讨论上林苑空间布局,不能忽略其依托的自然地理背景。上林苑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属暖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区。据史念海研究,史前这里曾布有森林,但秦汉统一后,伴随人口增加及土地开垦,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大规模林区已很难得见^①。故可推测,武帝重修上林苑应对当地植被进行过较大规模改造,而且若不经人为干预,苑内景观可能十分单调。结合气候、土壤条件推断,应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为主。先秦“囿”就属这类情况,它以原生景观为主,只是围以周垣,辟出专门区域供王室使用。但上林苑突破了这种形式:首先,改造苑内地形,大规模围凿河湖陂池;其次,丰富植被类型,广泛征集天下名果异树而形成“杂树林”。地形及植被的多样化多元物种提供了生存基础。

上林苑试图突破地理环境所限,表现出物种多元性追求,在这一过程中,异域动植物的驯化及引种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异域物种聚于一处并非易事,首先,获得它们就有较大难度,进贡虽是一种理想方式,但更多时候则需付出战争代价(如武帝为“天马”而征大宛)。而随后将其付诸展示环节时,新的困难又出现了:移植需考虑成活率,群臣远方所进名果异树仅为树苗,并非都能长成参天大树。据《三辅黄图》,苑中扶荔宫附近所植草木多为龙眼、荔枝、槟榔、橄榄等亚热带植物,但“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诛者数十人,遂不复蒔矣”^②。数年间不断移植南方植物,却相继以失败告终。汉代已掌握反季节栽培技术,如用“覆以屋瓦,昼夜燃蕴火”的自制“温室”便可培育“冬葵温韭”^③,上林苑应使用过类似方法培育亚热带植物^④。《拾遗记》有一条记载:“尚以宫室,崇苑囿……孝哀广四时之房……及夫灵瑞、嘉禽、艳卉、殊木,生非其壤。”^⑤说的便是以“四时之房”(温室)培育“生非其壤”植物。不过,从扶荔宫“不复蒔”来看,此法收效甚微。

尽管亚热带植物并未成活,但培育它们的扶荔宫却得以保留,并且始终在上林苑占据一席之地。可见,上林苑所重并非实体植物,而是它们所营造出的异域景观效果。在此意义上,宫观亦足以承担象征功能。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上林苑对异域的强调,可能具有“再现天下”的企求。除扶荔宫外,葡萄宫也是一个重要例证,《三辅黄图》称:“葡萄宫,在上林苑西。”^⑥值得注意的是,葡萄宫是文献记载中为数不多强调位置信息的宫观,这一设计之初衷,不能不让人想到是使葡萄与其产地西域建立关联。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曾指出中国古代宇宙秩序及地理秩序投射于苑囿之中,突出表现为异域物种象征性地处在苑囿中相应方位^⑦。汉学家浪漫的推测未必能被一一印证,但却提示了一条有益思路:上林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使异域物种对应其产地方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三辅黄图》仅在讲到葡萄宫时才强调其方位,因为苑中大多数本土植物并无代指产地功能,故无额外强调的必要。此外,博物空间成立的前提——改变物种原有活动空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并不被

①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32~313页。

②⑥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08、194页。

③ 相关讨论可参看崔建华:《汉代反季节栽培与“不时不食”观念》,《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第109~116页。

④ 秦汉之际,主要通过增温、增水等技术手段栽培亚热带植物,可参看文焕然:《从秦汉时代中国的柑橘、荔枝地理分布大势之史料来初步推断当时黄河中下游南部的常年气候》,文焕然等著,文榕生选编整理:《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146页。

⑤ 齐治平:《拾遗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8~149页。

⑦ 薛爱华:“中国古代的游猎与动物苑囿”(Edward Hetzel Schafer,“Hunting Parks and Animal Enclosures in Ancient China”),《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第11期(1968年),第318~343页。

提倡,因为这意味着秩序遭到破坏^①。那么,以破坏自然秩序为代价而建起的上林苑,就必须考虑重构一种新秩序,这是决定上林苑空间布局的基本思路。不难想到,当异域物种(或宫观)呈现出产地象征意义时,那么上林苑便可以被视为一个“微缩天下”,所以,上林苑在违背自然秩序的同时,也试图建立起新的秩序——模拟天下的政治秩序。上林苑以微缩景观模拟天下的做法,渊源可上溯始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②秦皇汉武相似的空间规划思路,均试图冲破地域束缚,对分散的军事征服地进行微缩写仿后,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集中布局。当他们俯瞰这一盛景时,“天下”仿佛尽收眼底。于是,抽象的帝王功绩转化为具体的视觉景观,权力也因之变得真实可感了。

但上引扶荔宫的例子又有些特殊,还需作补充论证。按说荔枝产自南越,扶荔宫本应建在上林苑南部,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三辅黄图》云:“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蔗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③《三辅黄图》仅说扶荔宫位于上林苑中,具体位置不详。宋敏求《长安志》卷四引潘岳《关中记》又云:“扶荔宫在冯翊。”^④但具体何县不详。1960年考古工作者对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门外韩渭公路东侧一处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刻有“夏阳扶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十二字篆书的方砖,认定该处为汉扶荔宫遗址^⑤,从而证明扶荔宫应在汉左冯翊之夏阳县^⑥。但这一位置已超出上林苑范围,在上林苑外东北方,这就与《黄图》“在上林苑中”有了冲突。陈直认为《黄图》之说当有所本,或因扶荔宫同属水衡都尉上林令管辖,故列入上林苑中^⑦。为何将扶荔宫建于夏阳呢?何清谷推测,夏阳是武帝东巡多次经过之地,元鼎六年,武帝正是在东巡途中“闻南越破”,于是就地建起扶荔宫。此外,夏阳又有黄河水运之便,适宜栽培南方草木^⑧。何氏推测大体可信。沿其思路,我们进一步认为,上林苑空间布局可能还存在另一原则——选择纪念性地点,夏阳正是武帝得知破南越喜讯之处,故于此建立与之相关的扶荔宫。此布局所循并非空间秩序,而是时间秩序。上林苑中白鹿观选址也属类似逻辑,据说是为了纪念周平王东迁时曾有白鹿聚集当地^⑨。尽管在严格意义上,扶荔宫并不算上林苑中宫观,但《黄图》称“在上林苑中”以及其亦归上林令管辖之事实,表明扶荔宫可视为上林苑组成部分。第一,扶荔宫的建造契机是破南越,这说明域外征服与域内博物空间的建立是结合在一起的,扶荔宫以时间而非空间的形式指代了南越;第二,扶荔宫周边不仅种植荔枝,更广植龙眼、槟榔、橄榄等亚热带植物,这样的植物组合说明有意以扶荔宫为核心,营造出帝国的“南国意象”。上述两点足以表明,扶荔宫布局同样旨在追求“微缩天下”视觉效果,并以之纪念和展示征服天下过程中所取得的军事胜利。

此外,司马相如《上林赋》亦多记卢桔、黄甘、杨梅等亚热带植物,前引《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统计《上林赋》中亚热带植物占据一半以上比重^⑩。虽然《上林赋》所记不能尽信,但其所描写的可能正是上林苑意欲实现却受限于地理条件而无法实现的景观,因此《上林赋》亦可证上林苑之异域猎奇心理^⑪。

在一个博物空间中,什么被特殊强调,反映了布局者的意图。陈列自然首先具有再现自然的“真实”追求,但这种“真实”有其限度——并非对原生自然环境进行客观再现。上林苑作为博物空间,试

① 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历代正史《五行志》记载不少因动物活动空间改易而诱发灾异的案例。游自勇对相关史料做过整理,并将其总结为“地点与方位”灾异,参游自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第90~94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8页。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示该条史料。

③⑧⑨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08、209、236页。

④ 宋敏求:《长安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⑤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韩城芝川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考古》1961年第3期,第123~126页。

⑥⑦ 陈直:《韩城汉扶荔宫遗址新出砖瓦考释》,《考古》1961年第3期,第126页。

⑩ 冯广平等:《秦汉上林苑植物图考》,第55~56页。

⑪ 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看周金泰:《从上林苑到〈上林赋〉:汉帝国的博物空间及其笔端营造》,《学术月刊》2021年第10期,第182~193页。

图展示的不仅是关中一地的自然状况,更是整个汉帝国甚至整个天下的自然状况,那么突出展示异域物种的意图就不难理解——不仅因为它们拥有更高的观赏价值,而且因为它们独特的象征意义——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天下”生态系统。这也不难解释,为何要不遗余力地移植并不适宜在关中生长的亚热带植物:不仅因为它们吸引人的奇异外观,更因为它们表征了“完整性”,尤其是表征了汉帝国异域扩张的成就。由于异域植物以象征意义为主,那么它们是否可以存活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并不是说突破自然条件限制的努力没有意义,而是某种程度上,保留宫观就足以实现其象征功能了。以宫观表征植物生态完整性,与现代自然博物馆中以灭绝物种化石补足完整生物进化链的操作十分相似。

四 求仙与帝国:上林苑的博物空间理念

上林苑的布局特点是突出展示异域物种,以再现宇宙及天下地理秩序。中国古代建筑空间常被视作微型宇宙,这是以往研究者普遍注意到的^①。上林苑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王家苑囿,自然更加如此,并在对宇宙秩序的构拟中传达特定理念。

探讨上林苑博物空间理念,首先需弄清上林苑观看者为谁,因为博物空间不仅反映了布局者的设计理念,更反映了布局者希望传达给观看者何种理念。上林苑的禁苑性质决定了其观看者应为特定人群:首先,最重要的观看者是皇帝。建元三年扩建上林,武帝是发起者,同时也是苑囿最终享用者,因此苑内设计围绕武帝本人意愿展开。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欲除以为上林苑”^②,可知修上林一事,由武帝总指示,并由吾丘寿王、待诏能用算者二人等具体负责。吾丘寿王据其本传,最擅“格五”术,据师古注可知格五乃汉代博戏^③,学界对汉代博戏已有较充分讨论,认为其模拟式盘,颇与宇宙时空等数术理念有关^④,可见武帝委任吾丘寿王等人扩建上林,似有追求宇宙图式的特殊考虑;其次,外宾也是上林苑重要的观看者。武帝一直有向外宾展示“汉之广大”的炫耀心理,《汉书·西域传》讲完“广开上林”,紧接着就讲“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⑤,故不难推测武帝亦使外宾游于上林。此外,同传亦多次提及上林苑曾用于招待外宾,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⑥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单于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⑦上林苑发挥外交功能的同时,自然也向外宾进行展示。因此,上林苑主要观看者是皇帝及进入苑中的外宾,并与皇帝本人意愿及向外宾炫耀心理有关,这是我们讨论上林苑博物空间理念的前提语境。

上林苑空间布局首先配合了武帝的求仙意愿,从而体现出方术理念。武帝好神仙事,除向东求封禅,向西求天马、昆仑山、西王母外,其坐镇长安时,日常求仙方法就是搜罗异物以装点日常所居。据《史记·封禅书》,这来自燕齐方士建议,“宫室被服非象神”便可招致神仙^⑧。汇聚天下异物的上林苑也有这一功能,它可理解为用于求仙的“神圣空间”^⑨。苑囿具有通神功能,此观念先秦就已出现,见于《诗经·大雅·灵台》的周文王“灵囿”,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王家苑囿,胡司德(Roel Sterckx)认为“灵囿”指“灵异之园”或“神圣之园”^⑩,这个解释不免望文生义,因为《说苑·修文篇》解释道:“积恩为

① 如汉宝德指出:“将居住环境象征化,映射为一个小的宇宙。这种观念也表现在建筑上。秦汉的纪念建筑如明堂、辟雍,在坐落的方向上,在建筑的格局上,不单象征了宇宙,而且反映了时、空的秩序,是西方文明中所没有的。”(氏著:《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页)

② 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7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94~2795页。

④ 除杨宽(《六博考》1948年)劳幹(《六博及博局的演变》1964年)等早期成果外,讨论博戏数术意义的主要成果还有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第1~30页;李学勤:《〈博局占〉与规矩纹》,《文物》1997年第1期,第49~51页;陈侃理:《北大汉简数术类〈六博〉〈荆决〉等篇略述》,《文物》2011年第6期,第86~87页。

⑤⑥ 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28、3905页。

⑦ 班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817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68页。

⑨ 关于中国古代禁苑“神圣空间”性质的讨论,可参看佐川英治著,郭雪妮译:《宗庙与禁苑——中国古代都城的神圣空间》,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33页。

⑩ 胡司德著,蓝旭译:《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爱,积爱为仁,积仁为灵。灵台之所以为灵者,积仁也。”^①可见灵囿之“灵”无“灵异”意。但灵囿仍具方术色彩,我认为主要通过囿中景观“灵台”来体现,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云:“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②表明灵台可通于天地,这得益于“台”的建筑形式。“台”的两个特点是其发挥方术功能之关键:第一,台高近天;第二,台可容纳异物。这两个特点使“台”接近并模拟天界,故可招致神物。早期文献提到“台”,大多强调的是这两个特点,甚至包括臭名昭著的商纣王鹿台和沙丘苑台,《史记·殷本纪》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③《新序》云:“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④上述记载常被用来证明纣之奢暴,而背后的方术意义则被忽略了。又,《拾遗记》提及周灵王登“昆昭之台”而遇仙,虽为传说,但其对昆昭之台“台高百丈,升之以望云色”“聚天下异木神工,得崿谷阴生之树”的刻画,也强调台高近天与容纳异物而“招致神异”^⑤。

上林苑延续了上述观念,它虽未广布各类仙台,但值得注意的是“观”这类建筑,学者注意到“在汉代文献上出现的园林建筑的字汇,与后世略有不同。那时代尚没有出现‘亭’字,但‘观’却不少”^⑥。汉代的“观”不能简单理解为后世“道观”那类低矮建筑,而与彼时另一都城象征性景观“阙”表现出关联性,渡边信一郎认为“在汉代的字书中,阙与观被定义为相同之物”^⑦。崔豹《古今注》记录了汉晋时期“阙”“观”这类建筑的形制:“阙,观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故谓之观……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画云气仙灵、奇禽怪兽,以昭示四方焉。”^⑧“观”延续了“台”的两个方术特点:首先,“观”因眺望远观而得名,这说明它拥有近似“台”的高度,同样可实现近天以观云气的效果;其次,“观”多以奇草异兽入名,说明也可视其为异物收纳空间^⑨。易言之,上林苑之“观”与《封禅书》中武帝所建各类仙宫楼台性质相近,同为收纳异物以招致神仙的神圣空间。《封禅书》中方士公孙卿提出“仙人好楼居”,建议武帝欲招致真仙,首先需建造名为“观”的建筑:“今陛下可为观,如缙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⑩《上林赋》对“观”的刻画大多“俛杳眇而无见,仰攀撩而扞天”,还写到仙人灵囿“燕于闲观”,亦是“观”可致仙的明证^⑪。而中国古代苑囿建筑,从先秦的“台”,至秦汉的“观”,再至六朝以降的“亭”,肉眼可见的规模变化背后(高度渐次降低,离天越来越远),可能也是方术色彩日趋淡化的过程。

上林苑另一体现方术理念的设计是其宫观弥山跨谷,并有辇道联通。《上林赋》称“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缃属,步檐周流,长途中宿。”^⑫此记载不能单纯视为虚夸,应有现实依据,《史记·梁孝王世家》称刘武梁园:“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⑬诸侯王园林尚已实现复道联通,那《上林赋》关于上林苑“弥山跨谷”“辇道缃属”的描述应当近实。上林苑这种设计也有方术方面的考虑,应是继承了秦阿房宫传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⑭阿旁宫复道设计来自方士卢生的建议,其设计目的是皇帝行走于复道时,可以隐瞒行踪,达到趋避恶鬼、出神入化等效果。同时,复道行空有如仙人腾云驾雾,亦可实现“象神”的视觉效果,从而迎合始皇帝“慕真人”的心理^⑮。

① 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6页。

② 何休注,许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42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35页。

④ 石光瑛:《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98~800页。

⑤ 齐治平:《拾遗记校注》,第73页。

⑥ 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第25页。

⑦ 渡边信一郎著,徐冲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

⑧ 牟华林:《〈古今注〉校笺》,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版,第56页。

⑨ 上文指出,稀见动物多入“观”中,是因为数量稀少,不及“圈”的规模。现在看来,亦与“观”之方术内涵有关。

⑩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81页。

⑪⑫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69、3668~3669页。

⑬ 司马迁:《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第2533页。

⑭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28页。

⑮ 关于复道设计与方术关系的讨论,可参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上林苑中著名的昆明池更是集中体现了方术理念。昆明池之修建,最初可能出于军事目的,即《史记·平准书》所云:“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①但待到昆明池穿凿成功,其功能并不限于讲习水战^②,从布局来看,亦体现出深刻的方术动机。《三辅故事》云:“昆明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③又《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④据上述记载,昆明池中置有石鲸,两岸又置牛郎、织女石像各一,这些浪漫的记载并非传说,而相继被考古发现证实,石鲸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牛郎石像位于今斗门镇东南方向石爷庙,织女石像位于今北常家庄石婆庙^⑤。这些布置显然不仅为了装饰,正如上引《关辅古语》所示,是出于“以象天河”目的,隐喻了昆明池与天汉的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象天法地”原则的体现,巫鸿指出:“织女像和牛郎像分别被放置在相对的两岸,使该池成为对银河的模拟,池中有一巨大的石鲸,把这个人造湖泊转化成一个汪洋大海。”^⑥秦汉时期,以牛郎织女神话表现天汉的做法十分常见,又如秦都从渭北扩展至渭南,亦称“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⑦。通过精心布局,昆明池实现了对宇宙银河的构拟,最终意图也是为了象神、通灵和招致神物。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⑧这里长卿虽指出《大人赋》更为华丽,但不能否认此前“上林之事”已经迎合“上好仙道”的心理。又据《史记·李斯列传》,太卜曾言秦二世“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二世遂“入上林斋戒”^⑨,可知秦时上林苑已是举行宗教事务的方术空间。《史记·封禅书》:“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观。”^⑩此神君乃武帝时一位女巫,被安置于上林苑,亦可证该地方术空间的属性。由于异物在武帝求仙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那么收纳异物的上林苑自然不可能脱离求仙背景,特别是它又进一步调整异物布局,形塑出仙界般的视觉效果,满足了武帝招致神物的心理期待。如果寻找一种“精神力量”主导了上林苑扩建,那么显然不是后世园林常见的儒道意趣^⑪。上林苑继承了先秦灵囿传统以及秦始皇求仙实践,这个博物空间仍被方术理念左右着。

上林苑试图模拟仙界,除希冀以此招致神物外,也体现出“包揽天下”的诉求,因为汉人认知中,“天下”是包含现实、域外、仙界的多层次空间世界^⑫。苑中建章宫、长杨宫等遗址均出土“汉并天下”字样瓦当^⑬,是上林苑“微缩天下”布局意图的直观证据。上节已论证上林苑空间布局特点是“再现天下”,需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一布局的深层动机是什么。

对此,应结合上林苑实际功能予以回答。上林苑虽表现出向综合性多功能皇家园林过渡的趋势,但并未完全同先秦“囿”传统决裂,因此狩猎仍是其核心功能。佐川英治指出:“西汉时期长安的上林苑主要是作为田猎的场所,是为了展示军事威力以在气势上压倒异民族和诸侯。”^⑭显然,狩猎并非简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731页。

② 关于昆明池军事外实用功能的讨论可参看汪菊渊:《中国古代园林史(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5页。

③ 张澍辑:《三辅故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④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第254页。

⑤ 相关调查研究可参胡谦盈:《汉昆明池及有关遗存踏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第23~41页;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9页;王煜:《汉代牵牛、织女图像研究》,《考古》2016年第5期,第86~97页。

⑥ 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⑦ 陈桥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52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702~3703页。

⑨ 司马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3107页。

⑩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664页。

⑪ 中国园林特别是宋以后园林设计,常被理解为儒家士大夫情结与道家清修理念之结合,相关讨论极多,如吴欣:《儒家山水:从风景园林到格物致知》,吴欣主编:《山水之境:中国文化中的风景园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42~179页。

⑫ 刘晓达:《汉武帝时代的上林苑与“天下”观——以昆明池、建章宫太液池的开凿为论述中心》,《美术学报》2017年第3期,第9页。

⑬ 刘庆柱:《战国秦汉瓦当研究》,《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

⑭ 佐川英治著,郭雪妮译:《宗庙与禁苑——中国古代都城的神圣空间》,陈金华、孙英刚编:《神圣空间:中古宗教中的空间因素》,第129页。

单的帝王娱乐,而是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狩猎活动经常在外宾面前上演,《汉书·成帝纪》载元延二年(前11年)成帝“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①,安排外宾进入上林苑跟随帝王狩猎,背后自有炫耀心理,亦表明狩猎近似军事演习,并带有礼的性质^②。《白虎通·巡狩》对“巡狩”的解释为:“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义,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③《孟子·梁惠王》对“巡狩”的解释是“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④，“狩”是同于“守”的。上引《白虎通》训“狩”为“牧”，意味着巡狩如同放牧一般，检视诸侯的同时也滋养了天下生灵。可见汉人观念中，巡狩未尝不代表对天下物种进行检视。上林苑以微缩天下形式生动再现了帝国，当帝王游猎其中并与苑中物种充分接触时，就好像游走于整个帝国并检视着帝国的土地与生灵，这大概就是上林苑尽力追求物种完整性并依地理秩序进行布局的深层意图。诚如胡司德所论：“苑囿就像宇宙的缩影，赞颂着君王统治万类生灵的权力，这种象征功能在帝国时代早期十分显著。汉帝国的政治扩张与生物种类的多样化是合拍的，所以畿辅地区的苑囿集中着帝国各地有代表性的物种。”^⑤

动物作为宇宙生灵，却被限定于封闭空间并加以驯化，甚至被猎杀，这些行为充满隐喻。征服异域动物可间接表明对其源产地的征服，狩猎由此就表现出征服并控制天下的意图。上古时代的战争，往往伴随着捕获动物行为，据《逸周书·世俘》所载，武王伐殷期间曾外出狩猎，随行捕获了虎、犀、牝、熊、黑等野兽，带回镐京并饲养于天子苑囿^⑥，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纪念一次军事胜利，也可能是为了在日后狩猎或献祭时使用它们，以重温昔日胜利喜悦并确认对于殷地的征服。因此，将战争中捕获动物饲养于苑囿显示出权力象征意义。上文讲到扶荔宫因破南越而建，并在宫内努力培植亚热带植物，亦是相近心理之反映。上林苑中被突出展示的异域物种乃其产地化身，物种生存空间突破了地理界限，间接表明汉帝国势力也突破了相应地理界限，从而释放出无远弗届的政治信号。与其说上林苑展示的是异域物种，倒不如说展示的是征服异域的军事成果。皇帝观看上述景观时，仿佛欣赏自己的武功成就一般，满足了其作为帝王的雄心壮志。而当这一切被进入苑中的外宾看到时，所产生的震慑效果亦不言而喻。

除狩猎外，苑囿中还不断上演着斗兽活动，这是又一项具有隐喻意义的娱乐活动。斗兽所表现的是人类对于自然的暴力征服，而对自然的征服未尝不可移至人类政治世界。武帝时常亲自上阵：“天子方好自击熊羆，驰逐野兽。”^⑦在斗兽中，武帝树立起孔武有力的君王形象，并充分展示出沉稳与机智，观看者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联想——在处理帝国政务时，眼前这位皇帝拥有同样的沉稳与机智。就心理机制而言，驯服动物与驾驭臣民不无吻合之处，因此，由斗兽而建立的权威可以延伸到政治世界继续发挥效力^⑧。

境内物种的丰富性是帝国实力的体现，一个足够自信的帝国无需隐藏其实力，而有将之付诸展示环节的强烈欲望。上林苑的建立，初衷是为帝王提供游猎场所，但最终无疑迎合了上述欲望。因而，武帝治下的上林苑可视为一个“陈列帝国”的博物空间，它再现了帝国，使帝国实力以一种具象化的物质形式被勾勒出来，并以一种直接、高效的方式被人观看及接受。在这个博物空间中，选取哪些物种进行陈列，如何对物种进行布局，人类——尤其是皇帝如何与物种进行互动，都体现出象征意义。象征意义错综复杂，但有两点是被突出强调的：第一，上林苑利用其汇聚天下异物的优势，刻意布置成人间仙界，表达了成仙的方术理想；第二，上林苑以“物种”表征“区域”，营造出“微缩天下”的视觉效果，

① 班固：《汉书》卷一〇《成帝纪》，第327页。

② 杨宽对先秦大蒐礼的研究指出狩猎具有军事检阅及军事演习的礼仪性质，汉代应继承了这一传统，相关讨论见氏著：“大蒐礼”新探，《古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284页。

③ 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9页。

④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75页。

⑤ 胡司德著，蓝旭译：《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第146页。

⑥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33~434页。

⑦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99页。

⑧ 以掌控动物能力凸显统治者权威，类似行为在古代欧亚大陆广泛存在，相关讨论可参看托马斯·爱尔森著，马特译：《欧亚皇家狩猎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252页。

表达了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政治理想。如此,皇帝与仙界及天下的联结,被象征性地表现于上林苑的博物空间配置上。

五 余论:上林苑的另一面

记载扩建上林苑的史料出自《汉书·东方朔传》,但那里面的扩建上林却是一个负面事件:东方朔进《谏除上林疏》极力反对扩建上林,理由包括夺民农桑、不恤农时、坏民冢墓、发人室庐等^①。此外,司马相如《上林赋》曾被史迁讥为“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②,可即便在这篇“侈靡”的赋作中,长卿在结尾处依旧委婉表达了劝谏意图:赋中天子游猎之后大宴群臣,乐舞正酣之际,忽有一番自我醒悟,先是慨叹“此泰奢侈”,继而“解酒罢猎”,最后向庶民开放上林:“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隳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③

上述两则案列生动表明,见证帝国荣耀的上林苑,在汉代士人那里是不被待见的。无独有偶,上林苑云集天下物种,是以武帝域外扩张搜求异物为前提的,此举亦曾招致争议,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的批评声尤为激烈^④。《汉书·西域传》描述上林盛景后,亦话锋一转指出搜求异物引发国库紧张、民生凋敝等一系列问题^⑤。可见后世司马光评价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云云,并非宋人基于自身政治文化语境的重构,回归汉代历史本身,乃是实情。一边披载荣光,一边却招致骂名,该如何解释上林苑同时载负的两种相反声音呢?

或许我们还应回到上林苑自身寻求答案。上林苑虽可视为博物空间,但其却私属于皇帝,未面向庶民开放。中国古代帝王常居深宫之中,这极大限制了其自由。微服出游虽是一种解决办法,但常被认为有失“国祥”,而且还会对帝王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东方朔传》载武帝欲扩建上林苑,起因之一就是其某次微服出行,与当地百姓产生冲突,随行猎手甚至被县令扣留^⑥。《东方朔传》讲扩建上林之前特地先讲武帝涉险这个插曲,似乎也是为扩建上林做辩护。所以,在保障帝王人身安全前提下又能满足其游玩之需,理想方案就是辟出私属禁苑,这大概也是上古设置苑囿之初衷。但是,帝王个人享乐无疑与儒家倡导的理念背道而驰,特别当禁苑侵夺百姓农桑之时,又不得不面对“公私矛盾”压力^⑦。据《史记·酷吏列传》,武帝朝酷吏减宣怨恨属官成信,成信逃匿上林,减宣派人追杀,无意射中上林苑门,最后宣竟被以大不敬罪判灭族^⑧,此事足见上林苑壁垒森严以及与民间对立之严重。

在理想的博物学世界中,帝王应是滋养万物生灵的圣王,该如何平衡此形象与私人享乐之间的矛盾呢?事实上,苑囿产生伊始,儒家经典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案,《诗经·大雅·灵台》云: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鹄鹄。王在灵沼,于物鱼跃^⑨。

上述记载不断被后世儒家典籍提及,足见影响深远,如《孟子·梁惠王》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麀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⑩又《毛诗序》云:“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⑪灵囿本为文王游乐之地,反被用来证明文王拥有受命之德,不仅庶民归附,甚至动物也乐享其中,造就这一和谐景致的关键在于文王将灵囿开放给了庶民,真正做到了“与民偕乐”。上引《上林赋》天子自省之后,最终亦将上林苑开放给庶民,便是这一理想的延续,说明至汉代,渴望帝王共享私家苑囿的情结依旧存在,这应是汉儒抨击上林苑的深层原因。帝王与博物空间的理想关系是:帝王不仅通过“展示”博物空间而建立权威,更通过

①⑥ 班固:《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49~2850、2847页。

②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89、3686页。

④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01页。

⑤ 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928~3929页。

⑦ 关于中国古代山林川泽利用中“公私矛盾”的问题,可进一步参看夏炎:《古代山林川泽利用问题再检讨——以“公私共利”原则为中心》,《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第46~53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第3825页。

⑨⑩ 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24~525、524页。

⑪ 赵岐注,孙毓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65~2666页。

“分享”博物空间而体现仁德。因此,不能仅从经济利益角度解读汉儒开放上林的诉求,而应视之为儒生对仁政的期许。

历史上,上林苑的确发生过还田于民的情形。但颇为讽刺的是,还田于民非为施行仁政,无一例外不是国力衰微时统治者的被迫之举。如汉初经济凋敝,高祖便曾将上林苑开放给民间经营:“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①待国力恢复,上林苑旋即复归禁苑,《史记·萧相国世家》载高祖十二年(前195年),萧何请求复开上林,此建议立即引发高祖不满,凸显了士人理想与皇权之间的紧张^②。建元三年,武帝以国力恢复为背景扩建上林,值得注意的是,同年张骞出使西域,为多元物种汇聚上林创造了条件。武帝在位期间,无疑是上林苑发展的繁盛期。又据《汉书·贡禹传》,武帝崩后,霍光徙苑中异兽充实茂陵:“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瘞藏之。”^③此举可能对苑内物种多样性造成影响,进一步表明上林苑博物空间属性与武帝统治呈现出同步性。大约元帝以后,汉帝国国势渐衰,史料已很少见到扩建上林苑的记载了,相反,还田于民的声音则再度出现^④。可见,只有当国力衰微时,统治者出于创收目的,才将上林苑开放给庶民,“仁政”就以这样一种诡诞的方式“实现”了。这也为本文提供了另一角度的论证——在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帝王滋养万物仅是一种政治修辞,王家苑囿作为陈列帝国的博物空间,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权力烙印,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不会轻易分享给庶民。

收稿日期 2021-07-18

作者周金泰,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The Empire in Display: The Natural History Space of Shanglin Garden of Han and Its Necromancy and Political Ideal

Zhou Jintai

Abstract: Emperor Hanwu expanded Shanglin Garden in the third year of Jianyuan, which showed the pursuit of diversity of species. Although the species in the garden had practical uses, they also had a display function. Therefore, despite being designed to satisfy the hunting interest of emperors, Shanglin Garden could also be regarded as a natural history space. The species in the garden were lai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niverse and geographical order, which constituted a “miniature world”. The arrangement of Taiguan(台观), Fudao(复道) and Kunming Pond(昆明池) made Shanglin Garden a simulation of the fairyland, and it was also constructed as a necromancy space that could attract gods. The emperor hunted and received foreign guests in the garden, and conquered species in the garden with politically symbolic significance, which was an exhibition of the strength of the empire. In general, Shanglin Garden was an ideological landscape which integrated species display, alchemy, and imperial rule.

Keywords: Shanglin Garden; Natural History Space; Emperor Wu of Han; Necromancy; Empire

【责任编辑 徐莹】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467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第2450页。

③ 班固:《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1页。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示该条史料。

④ 如元帝初年,谏大夫贡禹曾建议开放上林苑。关于汉帝国国力兴衰与上林苑发展关系的讨论,可进一步参看周亚:《秦汉上林苑的功能及其与都城发展之关系》,“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